

ZHONGGUO DANGDAI MINGJIA XUESHU JINGPIN WENKU

主 编 刘继才 郭爱民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傅璇琮
卷

汉语言文学类

傅璇琮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石化集团总公司

1998



主编 刘继才 郭爱民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汉语言文学类

傅璇琮
卷

傅璇琮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傅璇琮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傅璇琮卷 / 傅璇琮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517-0808-1

I. ①中… II. ①傅…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C53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2587 号

出 版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室)

传真: 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0265 (社务室)

E-mail: neuph@neupress.com

http: //www. neupress. com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组稿编辑: 孙 锋

责任编辑: 郎 坤

封面设计: 刘江旻

责任校对: 一 方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0808-1

定 价: 78.00 元

最大的心愿是為學界辦實事。家
大的快慰是得到學界的信知。謹
以此自勉。並望學界友人共勉。
甲午年夏 傅璇琮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傅璇琮

副主任：彭定安 娄成武 林木西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纲 艾荫范 田鹏颖

刘继才 陈 凡 林木西

娄成武 夏中华 郭爱民

傅璇琮 彭定安

出版说明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花在雨露滋润下竞相开放，出现了繁花似锦的美好景象。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在这些科学成果中，既浸透着老一辈专家辛勤耕耘的心血，也留下了中青年学者努力探索的足迹。这是“学之大者，国之重器”。为了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展现一代学人的风范，我们从他们的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精品，重新编辑出版，以求一册在手、精华尽览，以免去读者东寻西检之苦，既便于阅读，又便于珍藏。

《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入选的图书，是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其中不乏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力作。其作者大多是国内某一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他们的代表论著，基本上达到了国内一流学术水平。

为了保证《文库》的出版质量，我们特聘请几位学术大家担纲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们是：国学大师、著名文化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编审，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傅璇琮教授；著名学者、文学家，辽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原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联顾问，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彭定安先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办MPA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姜成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攀登学者”，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木西教授。

对入选《文库》的作者设定的“门槛”是：“两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二级以上正高级职称者。但我们又不是唯职称论，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而从未参加职称评定的知名学者，也在入选之列。我们秉承“三不选”的原则对入选者的论著进行遴选，即：不代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论文不选，观点陈旧的文章不选，一般应酬性、无学术价值的序言不选。所入选的论文虽然大多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但这次重新出版时，作者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有的论文补充的文字甚至超过原文的一倍以上，既具原创性，又有一定前瞻性。编者在文稿审读、装帧设计、材料选择和印刷装订等环节全面贯彻精品意识，力求精益求精。因此，《文库》的出版并非“冷饭重炒”，而是力图有所创新，俾使读者一快朵颐。

在首批人文学科的著作中，既有学界泰斗和知名老专家的成名之作，也有优秀中青年专家的论文选萃。其学术风格同中有异，异彩纷呈。这里既有逻辑推理的严密，又有形象思维的疏朗；既有高深的学理，又有浅近的知识；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宏论，又有短小精悍的学术精品；既有层层剖析的透辟，又有娓娓道来的轻松。阅读这些著作，仿佛置身于科学的百花园，令人目不暇接，获益匪浅。当然，是否如此，尚有待读者诸君的品评。

本《文库》的第一批著作，推出人文学科5本、自然学科5本。以后每年我们都将陆续出版一批这样的论著。

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出版工程，不仅需要学界专家的配合，而且冀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大家一道，努力把这项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好，为伟大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增光添彩，使科学园中的百花争奇斗艳，更加绚丽多姿！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26日

珍珠链上的钻石（代序）



刘继才

如果把傅先生的等身著作比作一条长长的珍珠链，那么他为这些著作所作的序言、前言和后记，则是镶嵌在珍珠链上的钻石。珍珠璀璨夺目，价值不菲；而钻石熠熠生辉，弥足珍贵。本书共收录傅璇琮先生所撰的序言、前言等41篇，可谓篇篇精彩。

初接傅先生来电嘱我为其大著撰序，一时不胜惶恐。以我的浅薄学养，实难当此重托；但又不敢推辞，只好勉为其难。

序，是一种文体，原是评价著作的文字，通“叙”。唐宋以降，将送别赠言之文也称为序。在古代，序又称为弁言。弁，指男子穿礼服所戴之冠。既然是头上之饰物，那便关乎一个人的形象，所以不能不说重要。傅璇琮先生一向重视撰写每本书的序言或前言，凡是他所撰写或编纂的书，都有一篇长长的序言。我拜读这些作品，获益匪浅，感触颇多，略陈鄙见：

一扇窗子。傅先生的这些序文等好似一扇窗子，打开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主要“陈设”。这不仅是阅读一部书最先看到的文字，而且是关乎读者能不能看下去的关键步骤。记得在傅先生的大著《唐代诗人丛考》刚出版时，我翻开书便被其“前言”所震撼，他说：“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接着，他引用了丹纳一大段精辟的话，然后又说：“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的研究。”同样，我则是由读了傅先生这本《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通读了全书，并进而拜读了他的其他著作。由此可见“窗子”的重要。但是这“窗子”的大小也颇有讲究：“窗子”开大了，让人一览无余不行；开小了，让人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也不行。而傅先生的这些“窗子”则开得恰到好处。

一把钥匙。窗子无论开得大小，所见之物毕竟有限，要想登堂入室，还必须拿到开门的钥匙。而好的序文或前言，应当授人以钥匙。所谓钥匙，无非是让你找到宝藏的一种手段。有的“宝藏”或谓作者写作此书的宗旨，较为容易看出，如他的《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就开宗明义地说：

经过史料的清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以说明，而要研究，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尽管环绕牛李党争，环绕李德裕，历史记载纷纭繁杂，但是不从李德裕入手，无论对当时的政治或文学，都不能得到真切的回答。正因如此，我就用两年的时间，即1980年冬至1982年冬，撰写了一部约四十万字的《李德裕年谱》。

但在许多序文中并非一眼就能找到这把钥匙，还要经过读者的仔细揣摩和分析，但是只要经过认真阅读和思考是不难找到的，如《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在谈到编写这部长篇巨制的初衷时，便费了很多笔墨旁征博引地说明编写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且再一次引用丹纳《艺术哲学》中的那段话，然后才说：

研究文学确实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会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但具体如何着手呢？我后来想到了编年史。我觉得文学编年史将对整体研究起一种流动观照和综合思考的作用。这也是对于长时期以来文学史著作体例所感到的一种不足。当然，文学史著作有它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它不能完全为文学编年史所代替，两者可以并存，而当前的情况下，建立编年史的研究则应引起学界的注意，它确实有其他文学通史、断代史、文体史所不能代替的特点与优势。

一条路径。这里所说的“路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门径，俗称门道，即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方法。傅璇琮与钱仲联等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是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大型辞书，多达五百余万字，经过百余位专家共同努力，历经十年方告完成。序中所谈的编纂过程及解决所遇难题的办法，恰恰是难得的治学途径。他说：

应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近些年来开始为人们注意的学术史、学科史的研究。一门学科之可以建立学术史，是成熟的标志，而它的建立又可以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各自总结本学科的研究，就会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由此而总结出现在还可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并科学地吸收国外的或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在科学的、民族的深厚基础上。这部《中国文学大辞典》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有意识地安排学术史的条目。

二是捷径，读书时先读前言和序言是最好的读书方法，也是掌握全书梗概、要旨的一条捷径。傅先生的这些文章要言不烦，言简意赅，能让读者很好地了解他的写作意图以及在正文所看不到的精辟见解和有关知识。特别是有些卷帙浩繁的巨著，字数几百万至几千万字以上，要阅读全书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阅读其序言和后记，则是省时省力的好办法。倘若由此引起兴趣而阅读全书，那更是幸莫大焉。

傅先生书中的后记，又称补记、札记等，也十分重要。我认为，后记当是前言的延续，它与前言或序言同样值得重视。不过，后记较之前言，似乎写得更放开些，因而往往也能看到作者的真性情，更有可读性。但也不尽然，有的后记也同样十分严肃，如《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的前记，它对完整的四册《唐才子传校笺》而言算是后记。但这个前记的话题并不轻松，它是讲要增加第五册的原因。《唐才子传校笺》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此书还获得了新闻

出版总署首届优秀古籍整理二等奖。但是傅先生并不满足于此，又广泛征求意见，并请陶敏、陈尚君先生集中一定时间，对已出版的全书作一次检核，便写成 30 余万字的补正，于是破例又出了第五册。傅先生在这篇前记中郑重指出：“陶敏同志与陈尚君同志所作的补正，不仅仅是对前四册笺证的纠误补缺，其本身即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没有这第五册的补正，则前四册对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就将是极不完全的。”傅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精益求精的精神，不仅使我们学到的知识更加准确、完整，而且展现了令我们钦佩的学术大家的气度与风范。

一部年谱。傅先生这些序言、前言等较为具体地记叙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真实地了解到他的所思所想，即一部著作的写作缘起、构思过程以及与友人合作的学术交往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先生的治学成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这里既有解决学术难题的艰辛，又有完成任务后的快慰；既有对某些缺憾的反思，又有学术游历的欢乐。这是一部能感受到作者体温和心跳的特殊年谱，也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学术力作。它不仅为我们全面了解、深入研究傅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基本线索，而且展现了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和学坛巨擘的风采。

一怀情谊。先说情。这位似乎古板的学者并非“短于情”。他有时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使笔如画，描写生动。其名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不是主要运用考证和论述的方式，而是采用“描述的方式”，一扫以往学术著作的拘谨，写得生动形象，极富情趣。而这本著作的序也写得别致而灵动：

1984 年八九月间，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尔后又随会议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参观。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

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彩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到过敦煌的人，会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学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科学，变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样的不可逾越，那末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

这分明是一篇具有浓郁诗情的游记。此文之所以堪称佳制，不仅在于写景之优美，而且在于哲思之深沉，特别是将历史之情景与现实之画面相融合，使我们既为祖先的灿烂时代而骄傲，更为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辉未来而自豪。由此可以看出，傅先生既长于抽象思维，又善于形象思维；既长于考据，又善于描写；既长于以理服人，又善于以情感人。因此，我们阅读此书在获得学术收获的同时，也受到情的感染和美的享受。

说到谊，在他的这些文章中更是随处可以感受到。傅先生常常与人合作著述或编纂，所以学侣极多。有人说，只有善于发现别人长处而尊重别人的人，才能赢得朋友。傅先生正是这样的人。在他的前言或后记中经常真诚地赞许友人，尊重他们的劳动。在《唐诗论学丛稿》的后记中，他说：“深为我们这一代学人所取得的成就而欣慰。我觉得，古典文学界这一学术群体，实有一种承上启下的意义，时间越长，越能看出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我真想能有机会，像顾亭林那篇《广师》那样，来谈谈我所了解所熟悉的友人。难道我们只能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该来谈谈当代学人经历种种风雨之后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学术风貌和学术贡献吗？”他除了对许多合作者赞赏有加外，还特别深切地怀念起英年早逝的学侣：“汝煜同志长期在徐州师院执教，近十年来他在《史记》研究，在刘禹锡研究，在中唐文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不幸仅以五十之

年，溘然长逝。这使我想起韩愈一篇至情流露、感人肺腑的书信——《与崔群书》。”

傅璇琮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在考据学、文献学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泰斗。如今虽已年近耄耋，功成名就，但他仍孜孜不倦，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并一再表示要努力“多做一些实在的事”，“为后来者铺路”。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甘为人梯的精神，在当下尤为可贵。因此，傅先生这部文集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对青年学者将产生的无声而巨大的榜样力量。

2014年4月18日于沈北

前 记



我所撰写的学术性文章，除专题论文外，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学界友人或有关文化机构的著作所撰的序言；二、对有些已出版的著作所作的评论，即书评；三、为自己的著作或承担主编的书所撰写的前言。我自己觉得，这第三部分应也有学术特点，故此次应邀选辑我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21 世纪近年编著之书所撰写的前言或后记，以供学术界参阅。

自 1981 年起，我就应学者之邀，为其学术专著撰写序言，至 2008 年初，辑有七十三篇，编有一书，名《学林清话》，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确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评价，好几位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予以评论，认为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史。在这之后，又有学者或有关单位约我作序，自 2008 年上半年起，至 2014 年初，又撰有三十六篇。大象出版社即又与我联系，新辑此三十六篇，又选辑 21 世纪所写的书评（十一篇），编印一书，名《书林清话》。这可能会得到学术界的关切。正因如此，我就另编这部书，我觉得这部书，一方面可以表明我的治学意旨，另一方面又可反映我与学术界的文化交流，可能也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我自 1958 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初，两位老学者陈友琴先生与孔凡礼先生，分别向中华书局交他们各自所编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陆游诗评述汇编》。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命我审稿，我主张接受，并提出中华书局可以编印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以系统辑集古代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的评述资料。中华书局领导同意我的这一建议，以后就陆续组稿，出版了二十几种，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我自己就编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并写有前记。这应当说是我将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唐代诗人丛考》，成于1978年（序言即写于此年），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主要是考析唐代诗人的生平事迹，纠正不少史料错误（钱锺书先生评誉云“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同时又注意作家群体研究，并注意不同地区作家的创作特色，在序言中还特引用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的几句话。

20世纪80年代我编著有几部书，如《唐代科举与文学》，在序言中提出，想通过科举来了解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面貌。这是我关于文化研究的另一尝试。同时又继续重视古典文献资料的探索，编著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李德裕年谱》《唐才子传校笺》等。这几部书的序言，都对文献考索与作品整理研究作重点阐述，我自信，这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有一定意义。《唐才子传校笺》出版后，我于21世纪又编有《宋才子传笺证》（辽海出版社出版）。现在又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主编的《先唐才子传笺证》，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任罗时进教授主编的《明清才子传笺证》，都将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由此也可见，我这部《唐才子传校笺》是有一定学术影响的。

我这里想介绍两部较有特色的学术著作：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二是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分四个分卷：初盛唐卷、中唐卷、晚唐卷、五代卷，共二百余万字。我在总序中，较强调文学编年史对整体研究起一种流动观照和综合思考的作用，这是一般文学史著作尚未有的。老前辈学者程千帆先生为此书作序，赞誉此书“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这部书对古典文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如著名先秦文学研究专家、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就仿此编了一部《先秦文学编年史》，并约我为这部巨大著作写一序言，并推荐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由蒋寅先生与我合作主编，我们在总序中强调这是一种全新的设想，具有学术总结、学术探索和学术展望的意义。它的基本思想和内容构成都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在总序中对此有具体阐述，应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中特为提出：“五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通力合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可见，这部大书

是当代学术的集体成果。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筹划编撰《唐才子传校笺》时，注意到学术合作的可贵，便邀约二十几位专家参加，在前言中具体列叙专家名单。这种以个人专长和集体协作有效配合的方式，确实收到明显的效果。第一册出版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先生就写信给我，称赞此书“罗致各方力量，合力完成，确系功德无量之举”，“富时代特色”。21 世纪我主编《宋才子传笺证》，邀请五位专家任分卷主编，我与他们分别商议，共约一百几十位学者参加笺证，参与人数比《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还多。凡是与学者合作的，不管几十人、百余人，或二三人，我在前言中都有记述，以表示我对学术合作的信念。

2014 年 1 月 6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采访我学术情况的报道，特别引及我过去说的两句话：“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见张世林于 1999 年所编《学林春秋》中我的一篇文章《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现在这本书所辑的前言、后记抒写的本人治学心情，以及介绍与学界合作的情况，确表现我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尽量为学界做一些实事，由此也获得学术界、出版界的真诚协助，以此体会“信知”这一最大的快慰。我也借此谨感谢东北大学出版社与本套书编委会。

傅璇琮

2014 年 4 月上旬，北京